

知人論世

李懷宇

旅美十二家

余英時
張 灝
唐德剛
夏志清
張 充和
孫康宜
趙如蘭
林同奇
董鼎山
王鼎鈞
巫寧坤
劉再復

知人論世：旅美十二家 / 李懷宇著. -- 初版. --
臺北市：允晨文化，2012.04
面：公分. -- (允晨叢刊；137)
ISBN 978-986-6274-68-8(平裝)

1. 作家 2. 訪談 3. 中國當代文學

782.248

101005094

允晨叢刊 137

知人論世：旅美十二家

作者：李懷宇

發行人：廖志峰

責任編輯：楊家興

美術編輯：劉寶榮

法律顧問：邱賢德律師

出版：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

地址：台北市南京東路三段21號6樓

網址：<http://www.asianculture.com.tw>

e-mail：asian.culture@msa.hinet.net

服務電話：(02)2507-2606

傳真專線：(02)2507-4260

劃撥帳號：0554566-1

登記證：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字第2523號

印刷：欣佑彩色製版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裝訂：聿成裝訂股份有限公司

初版：2012年4月

版權所有·翻印必究

定價300元

ISBN：978-986-6274-68-8

本書如有缺頁、倒裝，請寄回更換



自序

二〇〇七年赴美訪問，是我刻骨銘心的經歷。此生恐無留學之緣，此行卻有遊學之樂。在旅途中，我有幸拜訪心儀已久的前輩大家，彷彿進入思想的夢境：探索感時憂國的源流，跋涉幽暗意識的荒原，穿越歷史三峽的時空，遨遊知人論世的海洋。

遙想漢唐盛世，長安城裏，從西域與東洋遠來求學者絡繹不絕。玄奘西遊，鑒真東渡，是心態開放與氣度恢弘的明證。而後世的天朝上國一旦故步自封，即使閉關鎖國，還是抵擋不住堅船利炮。大變局中，西學東漸成了風潮。一九〇一年，梁啟超在《中國史敘論》提出上世史為「中國之中國」、中世史為「亞洲之中國」、近世史為「世界之中國」的宏論，便是東西學術的結晶。開眼看世界者吹過歐風，淋過美雨，歸來報效祖國，多有非凡成就，清末民初的文化界似有英才輩出的氣象。奈何時局變幻，二十世紀中國被橫刀切成兩半，造就無數旅居海外者。蕭公權的《問學諫往錄》最後一章以「萬里寄蹤」為題，自述「我在一九四九年受聘到美任客座教授的時候沒有久居海外的打算。」後來決定「且住為佳」，可能是那一代旅美知識人的典型心態。此後在海外求學成長的知識人，其經歷之起伏，心境之

冷暖，遠非故國同胞所能瞭解。我赴美之行，並無雄心壯志，只是懷著求知的好奇，希望在暢談中瞭解心史。

旅美心史絕非一席談便可盡情袒露。但素昧平生的一老一少有緣相晤，頗有深秋客來茶當酒之趣，或能互解彼此的寂寞。中國古來有「適彼樂土」的憧憬，也有「鄉關何處」的惆悵；愛因斯坦曾題簽「為彼此的鄉愁」的肺腑之言，薩依德更寫出「格格不入」的切膚之痛。古今中外各有風情萬千，但有些情感是「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」。我訪問的多是爺爺的同輩人，頗能體會到美國雖有諸般好處，但老人家往往沒有兒孫在旁，不可能常享融融之樂。一位中國移民曾經告訴我：美國是「好山好水好寂寞」，中國是「又髒又亂又快樂」。當我有幸生活在快樂新世界，偶爾想起「賴有斯人慰寂寥」，不禁神遊萬里之外與千載之上。

我不相信人間真有理想的樂土。但在美國旅行時，重溫羅斯福新政的四大自由與馬丁·路德·金夢想的人人平等，頓感這個國度的崛起自有值得借鑒的經驗。自由、平等、民主、科學、法治等價值，漸漸成為現代社會的共識，我相信東方古老文明中也深含相近的思想，彼此可以交融。然而，在殘酷的現實世界裏，國度與組織的藩籬還是結成一張張巨大的網。

人間不如意事常八九，而夢想有時可以超越種種界線。我夢想民有、民治、民享不是政治家開出的空頭支票。我夢想寬容、同情、理解不是思想家構建的空中樓閣。二〇一二年已經來了，不管人類將面臨什麼樣的巨變，我依然心存夢想。

李懷宇序於悠然居

二〇一二年元月

目 錄

自序	3
余英時：知人論世	9
張 灝：探索時代	41
唐德剛：歷史三峽	65
夏志清：重評小說	89
張充和：古色今香	111
孫康宜：文學虔誠	133
趙如蘭：劍橋新語	157
林同奇：哈佛潛學	177
董鼎山：紐約夢尋	193

王鼎鈞：通達文章

211

巫寧坤：受難心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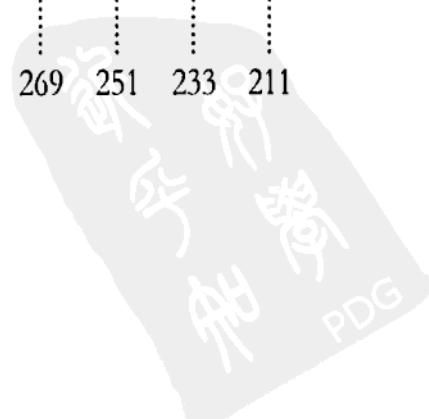
233

劉再復：悟證人間

251

後記

269





余英時：

| 知人論世



一、未成小隱聊中隱

如果人間真有世外桃源，對我而言，夢裏桃源便是普林斯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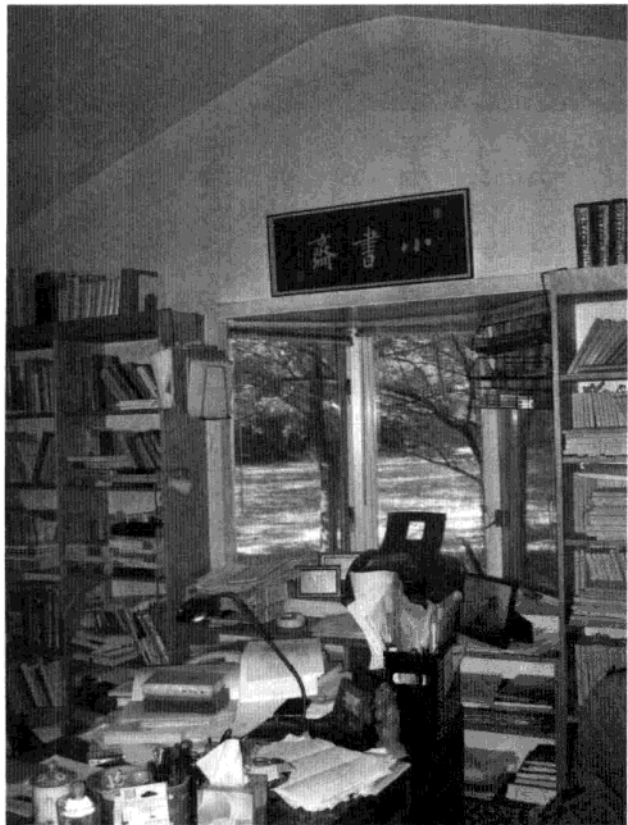
二〇〇七年秋天，當我準備美國之行時，設想的第一訪問對象是余英時。中秋節下午，我給余先生家發了一份傳真，心中不免忐忑，怕被拒之門外。中秋之夜，我給余先生家打了一個電話，接電話的是余師母陳淑平女士，從聲音裏可以感覺是一位大家閨秀。我大喜過望：余先生願意見我。赴美之行恍如夢境。二〇〇七年十一月五日，我到美國的第二天，從紐約坐火車到普林斯頓，余師母早在車站等候。

余先生在普林斯頓的生活近乎隱居。余家是樹林裏一幢獨立的房子，屋前一個小魚池，屋後一片小竹林，後來我多次陪余先生餵魚散步，頗有「悠然見南山」之趣。大書房上掛鄭板橋的書法「小書齋」。客廳中的字畫多是余先生的師友所贈，印象中有錢穆、俞平伯、張充和的作品。胡適的字是：「不畏浮雲遮望眼，自緣身在最高層。」余先生「集坡公詩句放翁詞句」而請他岳父陳雪屏先生寫的對聯是：「未成小隱聊中隱，卻恐他鄉勝故鄉。」我覺得此聯頗見余先生晚年心境。

冥冥之中有緣，我在普林斯頓盤桓了多日，與余先生暢談了五天三夜。如今回想，我的訪問生涯中從未有此奇緣。

在普林斯頓的日子，我受到余師母無微不至的照顧。每天從旅館到余家都由余師母開車接送。第一天晚上，因為時差的緣故，我失眠了，天剛一亮，我匆匆吃過早餐，便到普林斯頓大學裏閒逛。雨後空氣格外清新，校園之美，令我心醉。我在漫步中不免浮想聯翩，愛因斯坦在高等研究院的深思，胡適在葛思德東方圖書館的微笑，彷彿就在眼前。多少年來，我對普林斯頓心嚮往之，無非是因為已故二公與當代余英時。

那天早上在余師母的車子裏，閒聊得知我喜歡二公。有一天中午，余先生夫婦專門帶我



到愛因斯坦常去的校園餐廳吃飯，飯後兜到愛因斯坦的故居門前，如今的屋主剛拿了諾貝爾獎金。余先生沒有見過胡適，余師母的父親陳雪屏與胡適是至交，她告訴我：「我們家常常我開門。胡先生就常常會問我：你現在幾年級，家裏有什麼功課？他把我們小孩子也看成大人。」後來從余先生夫婦的待人接物中，我恍然覺得自己也是一個小孩子。

別後，我時常打電話到普林斯頓，人間趣事，心中煩惱，事無巨細，余先生夫婦總聽得津津有味。有時讀了余先生的著作或是和余先生通過電話，我會冥思時空的奇妙，古人今人，天涯咫尺，竟在神遊與笑談中穿越時間與空間的隔閡，這也許便是歷史研究的魅力。

二、愛好中國思想史的根苗

研究知識人的歷史世界，家學與師承不可不考，天賦與勤奮自然重要，胸襟與見識尤為可貴。

余英時的父親余協中先生畢業於燕京大學歷史系，但對歐洲史、美國史興趣更大，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八年赴美國考爾格大學和哈佛大學讀美國史。一九二九年余協中繼蔣廷

黻出任天津南開大學歷史系主任。一九三〇年，余英時在天津出生，母親張韻清因為難產去世。余協中傷心欲絕，舉家離開天津。余英時童年住過北平、南京、開封、安慶等城市。抗戰爆發後，余英時回到祖先居住的故鄉——安徽潛山縣官莊鄉。

王元化《一九九一年回憶錄》中說，在夏威夷開會時他談到中國的農民意識問題，引起了余英時的批評。余英時說抗戰初在農村住過，所見到的農民都是很質樸老實的，王元化則以一九三九年初在皖南新四軍軍部的親身經歷為例申辯。這段回憶錄引起了我的興趣，因此當面向余英時問起。余先生說：「佃戶跟地主的衝突到處都發生，但是那個衝突是不是提高到所謂『階級鬥爭』呢？個人所見是不同的。有的是佃戶欺負地主，地主如果是孤兒寡婦，那是沒有辦法的；地主如果是很強的退休官員，有勢力，欺負佃戶也是有的，不能一概而論。王元化的這個回憶錄我看過，但我們後來也沒有拿這些問題去爭辯了。我常常說，中國這麼大一個社會，比整個歐洲還大，不可能每個地區都是一樣的。」鄉下生活使余英時對傳統文化有參與的體驗，後來人類學家、社會學家的中國調查，在他看來有隔靴搔癢的感覺，並沒有真正抓住生活的經驗，只停留於數字上。

一九四三年前後，桂系有一個營的軍隊駐紮在潛山官莊，營長杜進庭大概做了不少貪贓

枉法、欺壓鄉間百姓之事，弄得民怨沸騰。余英時才十三歲左右，並未見過杜營長，但聽鄉中長輩說得太多了，而且每一件事都十分具體，所以心中頗為憤怒。不知怎樣異想天開，竟寫了一個很長的狀子，向政府控訴杜營長的種種罪行。這篇狀子寫完了，余英時便留在書桌上，後來自己也忘記有這樣一回事了。無巧不成書，余英時去了一趟舒城縣，有好幾天不在家，恰好杜營長的一個勤務兵到余家詢問什麼事，被引進余英時的書房，無意中發現狀子，大驚之下便把狀子送給杜營長。據說杜營長讀後不但憤怒而且驚恐萬分，懷疑狀子不是一個小孩子寫的，必是官莊鄉紳合謀控告他，要致他於死地。杜營長抓不到余英時，便召集鄉中有地位有頭面的人，當面追究，這些鄉紳本不知情，自然矢口否認，都說不過是一個淘氣孩子的遊戲之作。當晚鄉紳準備了豐盛的酒席為杜營長解憂，杜大醉後失聲痛哭，說這狀子如是官莊鄉人的陰謀，反正他活不成了，一定要大開殺戒，把余英時等相關的人全部槍斃。事隔一、二日後，余英時在夜晚從舒城回到官莊，先經過鄉間唯一的一條街，街上熟人見到他好像見到鬼一樣，臉上帶著一種恐懼的表情。其中有一、二老者催余英時趕快回家，不要在街上亂跑。余英時當時完全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，跑回家中才明白自己闖下大禍，使全家都吃驚受累。家人怕杜營長聞風來抓人，把余英時連夜送到一位行醫的老族兄余平格家，躲一

躲眼前的風險。余平格平時很嚴肅，不苟言笑，當晚接待余英時，開口便說：「我因為你年紀小，一直把你當孩子。但你做了這件事，你已成人了。從此以後，我要另眼相待了。」余英時回憶：「這一事件在我個人生命史上構成了一個重大的轉捩點。一夜之間我忽然失去了天真的童年，而進入了成人的世界。這一轉變並非來自我自己，而是我周邊的人強加於我的。這一突如其來的變化結束了我的童年，逼得一言一行都不敢不慎重，以免被人譏評。我可以說是被這件意外之事逼得走上了『少年老成』的路，在我的成長過程中，是不自然的。」這一「告狀」事件還有一個尾聲。時間稍久，杜營長大概已接受鄉人的解釋，也認為是一個頑皮孩子的戲筆。不過，他還要派一個受過較多教育的政治指導員來談一次。這位指導員經族人安排，在一個晚上和余英時吃酒用餐，談話中順便考考余英時的詩文知識，最後他相信「狀子」是出於余英時之手，而余英時並無真去控告杜營長的意圖。臨走時，指導員緊緊和余英時握手，表示願意成為忘年交之意。

余英時在鄉間很少正式上學，小學、中學都是分散地上過一兩個學期的學校。唯一與後來研究有關的是得到了一些古文、古史的啓蒙。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六年，余英時在桐城縣城舅舅家裏住了一年。桐城人以人文自負，但仍然沉浸在方苞、姚鼐的「古文」傳統之中。

余英時在桐城受到了一些「斗方名士」的影響，對舊詩文發生了進一步的興趣。他的二舅父張仲怡能詩，善書法，是清初張英、張廷玉的後代，在桐城是望族，與方、姚、馬、左齊名，但那時也相當衰落了。由於二舅父常和桐城名士來往，余英時從他們的交談中，偶爾學得一些詩文的知識。余英時至今還記得舅父在鍾馗畫像上題了一首七絕：「進士平生酒一甌，衣衫襤褸百無求。誇人最是安心處，鬚髮鬚鬚鬼見愁。」舅父的初稿首句最後三個字原作「仕不優」，以詩稿示一位詩友，那位詩友立即指出：「仕不優」當改作「酒一甌」。舅父大喜稱謝，稱他為「三字師」。「酒一甌」自然渾成，遠比「仕不優」的生硬為佳。余英時在一旁聽到這改詩經過，很受啓發，懂得詩句原來是要這樣「推敲」的。

在抗戰期間，余協中在重慶考試院做參事，父子分隔兩地九年，余英時在鄉間根本沒有碰到西方的書籍。多少年後余英時回想，父親無形中還是產生了影響：「我對西洋史有興趣是從父親那兒來的。他編著一部幾十萬字《西洋通史》，對我很有啓發。小時候看不大懂，但漸漸入門，對著作肅然起敬。因此我不光對中國史有興趣，還對西洋史有興趣，看看西洋史是怎麼變化的，我用比較的觀點來看歷史，很早就跟家庭背景有關。」

抗戰勝利後，余協中受杜聿明委託到瀋陽創辦東北中正大學。一九四六年夏天，余英時

從桐城重回安慶，然後到南京轉北平，最後定居瀋陽，期間找老師課外補習英文、數理化。

一九四七年夏天，余英時考進了中正大學歷史系。他回憶：「我選擇歷史為專業，一方面固然是由於我的數理化不行，但另一方面也是受父親的影響。我家所藏英文書籍也以西史為主，我雖不能閱讀，但耳濡目染，便起了讀西史的強烈願望。我課外閱讀則由梁啟超、胡適的作品開始，種下了愛好中國思想史的根苗。中正大學一年級的中國通史由一位青年講師講授，用的是錢穆的《國史大綱》，這是我第一次接觸錢先生的學術。因此，我在這所新辦的大學雖然僅僅讀了三個月，但我的人生道路卻大致決定了。」

此後戰局變幻。一九四七年十二月，余英時隨父親從瀋陽飛往北平，當時機場一共有三架飛機，余協中被安排在第一架，余英時則在第三架。當余英時正在排隊登機的時刻，余協中忽然招手要他過去，因為第一架還有一個空位。於是余英時在最後一剎那坐上第一架，結果第三架失事了。

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到一九四八年十月，余英時在北平閒居，開始接觸當時中國流行的思潮，受影響最大的要算儲安平辦的《觀察》以及結集而成的《觀察叢書》。他回憶：「這當然是因為我的心靈深處是接受五四以來的現代普世價值，如民主、自由、寬容、平等、人權